

民俗文化的 地方性表现

——以京东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为个案

在“国家—社会”的对峙框架下,“地方”^①在中国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为许多中国研究的学者所认可的。本文试图将“地方”与“地方性”这两个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存在方式具有根本性意义^②的概念,贯穿于传统节日文化的探讨之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节日习俗在各个地方的表现都不可能是均质的,而要发现节日地方性表现的丰富性及其所包含的文化解释,就必须将研究的视角由宏观向微观逐渐转移。这样,村落作为地域性社区的基本空间单位的重要性就凸现了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高碑店村视为一个地域性社区,^③考察与分析当地的节日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不想过多地讨论传统节日如何体现“民族性”文化内涵的问题,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探讨高碑店村较为特异的节日习俗上。因为只有“节日习俗的差异才能体现出在地方延续的传统,从而也深刻地体现出民族节日体系的统一性特征”^④。在这里,解读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并不想通过个案式的微观研究就做出整体性的推论,而是希望借由这种努力表明,小型地域性社区的个案分析能够提供一一个审视民俗文化地方性表现的角度,能帮助我们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更深



入地认识民俗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与地方表现的多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高碑店：从漕运码头到商农结合的村落

高碑店村，在元以前名为“郊亭”。《析津志辑佚》书载“平津闸三，在郊亭地”，《元史·河渠志》中称“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元贞元年改名平津”。高碑店村名形成较晚，据清《日下旧闻考》记载：“通州至京城，中途有高米店，或呼高碑店。”按宋洪皓《松漠纪闻云》：“潞县三十里至郊亭，三十里至燕，今之高米店疑即古之郊亭，郊，高，音讹也。”当地人还有说法称此地曾名为高蜜店，据传说可能与附近郎家园养蜂酿蜜，周围众人来此购蜜有关。清时为顺天府大兴所辖，现隶属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下辖高碑店和东店两个自然村。虽然经历了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更迭，但高碑店村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一直处于京畿重地的辖区之内。

作为由漕运码头渐变而成的村落，高碑店村民俗文化的特点与京城运河漕运的历史发展变迁是息息相关的。该村坐落在通惠河畔。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通州张家湾到京城的重要河段，也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水上运输要道之一。沿河而建的高碑店村，早在元代就因漕运的关系，成为皇粮商品的集散地。而现存的“老闸窝”^⑤遗迹、村民的口述历史加之文献典籍的记载，都说明了漕运的繁盛不仅促成了这个京郊村落的形成，而且为它带来了商机以及形成集市的可能。应该说，元朝修浚通惠河是高碑店村发展的重要节点，使其在国家层面上与北京城区发生了关联。或许正是因此，高碑店村的地名便由“亭”转为带有集镇性质的“店”。随着晚清以来海运的发达和铁路运输的替代，通惠河漕运功能渐渐衰微，再加上各地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位于通惠河重要闸口的高碑店逐渐成为五方杂处的杂姓村庄。

通惠河水沿村落北边自西向东常年川流不息，使高碑店村中部临河处地势较低。而地势的低洼和水源的充足，在通惠河沿岸与村



落中部形成了多个对高碑店人有着重要意义的鱼坑。之所以强调鱼坑的特殊意义,是因为村民记忆中的鱼塘毗邻且与之相关的渔业活动十分丰富^⑥,不仅暗喻着运河对当地民众生活与文化的影响,标示出高碑店村非单一农业村的村落属性,同时也表明了高碑店村民众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北京城区百姓生活的关联。特定的地理位置与村落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高碑店村的耕地面积,因此,农业耕种一直没有成为高碑店村民主体惟一的谋生手段。高碑店的村民往往身兼农民、鱼户、小生意人等数种行业职能。高碑店的小金鱼儿与蒲黄榆的菜、草桥的花一样享誉老北京城郊。因此,我们应当将高碑店村与华北地区大多数的传统农业村落区别开来,将它视为农村地区一个在由码头渐进到集镇的发展过程中被称为村落的特例。可以说,正是在京师文化和漕运文化影响下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了高碑店村商农结合的京郊村落文化,并使其在村落节日民俗的表现上具有了特质。

二、一淡一浓的高碑店村春节与五月节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要讨论的地方节日传统,是留存在高碑店村民众记忆中的传统形态,而不是当今生活的具体展现。本文所以关注这种记忆中的传统,是因为历史与社会记忆常被认为是凝聚了族群或社群认同的源头。^⑦我们知道,任何历史的发生和表述都脱离不了基本的群体背景和社会单位,而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对历史‘事实’的记录以及人们经过策略性选择的记忆方式无不打上‘地方性知识’的烙印”^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在民众的口述中,清楚地了解到在这个群体的公共记忆里究竟遗留了什么,而这种遗留的多个讲述版本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群体怎样进行记忆,这种记忆如何被打上“地方性知识”的烙印,这种带有地方性烙印的群体记忆如何与“历史的制造”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相对于华北地区其他传统村落而言,高碑店村村民对某些岁时节日的认知有着较为特异的表现,即在当地民众记忆中,春节与端午



节^⑨的比重表现出不同于常例的失衡。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中,历来被特别看重的春节,在高碑店村相对于端午节而言却显得冷清。而五月节因为与当地富有盛名的娘娘庙会会期的重合,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源自庙会举办地的高碑店人,同时也获得了周边多个村落村民的认同。下文将简略地对比高碑店村春节与五月节期间的民俗事象,以期展现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失衡。

作为“年节”之首,春节应该是华北地区民众时间观念中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经过长时段的历史沉淀,过年习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模式性特征。^⑩不过在具有差异性的地域空间和地域人群中,年节民俗往往会在“理想的节日类型”背后凸显出地方性的差异。虽然高碑店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使当地村民与北京城区百姓在日常生活模式,尤其年节生活程序上具有一致性。从腊月初八的腊八粥、腊月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到大年三十贴春联、福字、门神、踩岁^⑪,除夕的年夜饭、请灶王神码、祭神、包接神饺子、守岁,再到初一拜年,初二抢银水、祭财神,直至初五“破五”吃饺子,都不难发现其与北京城区传统的大年俗保持着统一。^⑫但是,每一事象具体的填充内容又有着高碑店村的地方性特色,即具有对节期休闲活动安排的简化和对春节团圆意味的弱化倾向。由于村落的构成主因是因漕运带来的杂姓村,民众记忆所及的各项年节活动,基本上局限在家庭内部,缺少村落整体性的族缘仪式活动或联村式的仪式活动,甚至连本地极富盛名的高跷老会都极少在过年时组织表演。在当地人的记忆与观念中,过年期间到北京城里贩鱼或售卖小金鱼儿是维系生计的重要事件,很多高碑店人都有不回家过年或正月初二过后就会恢复日常生活的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高碑店人对于年节的表述往往会勾连到几个月后的五月节上。与春节相比,五月节在高碑店人的认知中显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影响。^⑬按照当地民众的说法,到了五月节,家家都要换新衣,在外奔波的人即使春节不回来,这时都要回来。当然,老北京端午节的习俗如插蒲艾、贴剪纸、吃粽子等事象在当地村民的节俗生活中也有所



体现。这个节日的被重视主要应当归因于它负载了娘娘庙会这一载体,从而带有一种公共性的特征。如果将春节视为高碑店村的内部节日,那么五月节则是他们与外界进行联络的重要节日。娘娘庙会的会期是从五月初一至初六,而旧时过端午节讲究从初一过到初五。两者的时间大体一致。围绕娘娘庙会的信仰活动十分兴盛,除了烧香酬神之外,还有“拜香”、“跳墙”、“送驾”等仪式活动。娘娘庙会的商业贸易和娱乐活动也非常丰富,代表性交易物品多为农业生产用具、日常生活用品及应节食品。此外,还有从城乡各处涌来的花会、杂耍、游艺等娱乐项目。开庙期间,游人不绝,摊贩云集,香客纷拥,让五月节成为当地及周边村镇民众的狂欢时间。

当地民众如何安排不同节日期间的各项活动?他们怎样看待节日期间发生的各种民俗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意义?上文所展现的实际上是对这样一系列问题的解答,而解答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碑店人对春节与五月节比重失衡的记忆。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在这种地方性“历史”建构的过程当中,留存了多少当地民众对其自身所进行着的文化创造与变通的诠释和虚构;并以此为基点,去寻找失衡背后的发生动因,解析村落民众的生活形态对于节日文化形态构成的意义。失衡作为春节与端午节这两大民族传统节日在高碑店村的特异表现,所影射的并不是一个区别于华北社会的异型文化,而是在这样一个区域空间或地域社会中,节日体系的统一性特征如何在地方得以延续以及怎样延续的问题。诚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将审视的目光局限在高碑店村内部,那么当地民众的记忆确实展示了春节与五月节不同常例的平淡与浓烈。但如果将视野的范围扩大,在北京这个较大的地域性社区的传统节日体系中重新思考,那么紧随而来的就会是这样一系列问题:年味真的淡吗?端午的节味真的浓吗?高碑店人春节的出行与端午的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商农结合的生计模式与节日体系的开放性

民族传统节日一般是根据巩固生产和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建



立和延续的。节日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对各种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作为集体的意志能够使每一个人从情感上认同于自己的民族和地方社会,并且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节日的研究应该与全部的地方生活相联系。^④

如果我们从经济空间理论的视角,关注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的村落,就会发现,高碑店村之所以能作为地域性社区构成一个地域共同体,不可避免地是交换行为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施坚雅^⑤所强调的运输资源与地貌特点。而高碑店村民众如何过节同样是与其区域社会中独特的地理区位相关。京郊与临水的地理位置,形成了高碑店人对生计方式的独特选择。在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中,历史上各类店铺的存在构筑了一个相对浓厚的商业气氛,大部分村民对于商品交易具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因此,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商农结合的生计模式,即除了经济作物的耕种之外,还会依据季节在村落内部和北京城区进行各种小型商业活动。尤其是到前门西河沿及北京各牌楼贩鱼或到京城内部挑挑儿卖小金鱼儿,成为北京城里象征高碑店村的一种特色行业。这种行业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小金鱼儿的上市季节是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此时,也是城里鱼市场生意最为红火的时节。每到此时节,当地的村民就会从村中的鱼坑或城里的鱼市趸些小金鱼,趁着年节到城里胡同中去吆喝贩卖。而村中“有头有脸”的鱼户们也多半无暇忙于自身的年节。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生计模式或谋生需求使年节成为高碑店人一年中最忙的时刻,少有华北传统农业村落冬季闲暇的各项娱乐活动。农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年俗模式,形成了相对冷淡的节日习俗。

北京城里人有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喜好养小金鱼儿的人不在少数,希望在过年期间购买小金鱼儿以增添喜气的人数更多。因而,高碑店人进城售卖金鱼的行为,在京城年节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可见,高碑店人为“奔饭辙”而春节出行甚至不归的特殊选择,不仅是在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是服务于京城节日文化的需求。假若说高碑店村过年的年味“淡”,



那么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淡,才能烘托或增添了京城年味的“浓”。在这个意义上,春节习俗的地方性表现作为文化因子支撑了更大区域节日体系的统一。

高碑店人重视端午,最初可能是受漕运带来的南方习俗影响。据《日下旧闻考》引《明实录》,仅永乐年间,由湖广、江西征调的通惠河闸夫,即达二千三百多人,而这只是明朝初年人夫调动的部分反映。随漕运而来的南方移民很有可能成为高碑店村五月节备受关注的肇因。^⑥如果说高碑店村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关联着漕运文化的话,那么娘娘庙则更多地植根于本土民众广泛的日常需求上。从庙的属性上看,村民记忆中的龙王庙显然更贴近当地业缘群体的需求,但是随着漕运对当地民众直接影响力的下降,具有普适性功能(与生育有关)的娘娘庙在生活方式渐趋多元化的本村和周围村镇显示出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从目前的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中,我们尚不能明确娘娘庙会期与五月节重合的结构性关系,只能推测两者的结合可能暗喻着作为码头的村落与作为集镇的村落之间的角色转换。不过并无疑问的是,高碑店村的五月节因娘娘庙会而更加兴盛。也可以说,娘娘庙会成为高碑店村民众重视五月节的关键因素。

有学者在明清华北庙会研究中指出,庙会在通都大邑带有更多的文化娱乐色彩,而在乡村小镇则商业贸易色彩更浓。从庙会交易买卖的物品中也可看出城乡之别,城镇中庙会买卖的日用百货较多,杂以非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乡村庙会则多生产、生活必需品,实用性较强。^⑦比照之下,高碑店村的娘娘庙会活动,兼具了都市庙会的文化娱乐功能^⑧与村镇庙会的商业贸易实用性。^⑨不过,在高碑店村及周边村落的民众表述中,更多地体现了对其商贸功能的记忆。这就说明,娘娘庙会是一个基于生计交换需求产生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地方集市,它的存在与发展建构了高碑店村与周边城镇、村落业缘和地缘外联的通道,由此形成的庙市也成为了区域性的集市中心。上文曾经提及,春节期间极少露面的“公议助善高跷老会”,在五月节却会盛装表演,并会邀请北京地区其他地域性花会前来助会。这说明,



高碑店村的五月节除生计需求之外,还在村落自治组织形态与信仰层面勾连着村落外部(京城与周边村镇)的多种文化。在高碑店人构筑的这个集市平台上,文化的多元碰撞自然而然地会为五月节带来繁盛与热闹。

如上所述,在高碑店村五月节的空间架构里,虽然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与京师文化具有一致性的一般节俗,但填充于其中的内容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结构与诉求。而只有从地方性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发现,高碑店村节日传统中的失衡现象,所以能够在当地民众的内部知识体系里获得常态与普泛性的认同,主要归因于当地民众对生计模式的选择、内部业缘群体的构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并且,通过解读失衡与认同背后的发生动因,我们才能进一步剖析村落民众的生活形态对于地方节日文化形态构成的意义。

四、高碑店村节日传统的地方性与区域社会文化体系的一致性

对于节日的理解,如果放到村落的架构中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地方性的区域特征,即使是程度的不同,背后也隐藏着村落地域形态与生活形态的逻辑支持。帝都边缘与漕运枢纽的地理位置,使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无可避免地成为京城区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当地民众对节期活动有着自己的特殊选择,但作为地方性的表现,这种特殊选择在多种层面上与京城区域社会的文化体系保持一致。

由于高碑店村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独特位置,它在先天上就与北京城区及周边农村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而其村落生活也就拥有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就历史溯源而言,高碑店村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一直不高,因而村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也相对容易打破自给自足的局面,开放性程度比较高。与此相一致,作为城乡之间的交结点,村落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日常互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因此,高碑店村内部,地区中心型的民俗文化活动比较突出,这既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业缘和与外部世界特殊关系的影响。



基本来讲,从村落形成之日起,高碑店村的村民就不是严格意义上完全依靠耕种为生的传统农民。虽然在行政管理层面上看,占村落内部人口大多数的仍是农民,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务农的同时进行着商业贩运等劳作。在农业耕种以外,既有以养鱼、贩鱼为主的鱼户,以挑挑儿方式进行商业贩卖的小生意人,也有以看顾城内大户坟地为主的坟户,和在高碑店本地经营各种买卖的小商户。在高碑店盛极一时的后街,就曾毗邻着油盐店、骡马店、茶馆、饽饽铺等多家具有兼营性的商铺。村民职业构成的复杂性,使高碑店人与外部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因此,许多村民在接受了商业等其他职业群体的文化之后,其生活知识开始变得多样化。他们按季节或经常地外出和回归,促进了村落内部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互相交流。这种情况与一般华北地区的农村有所不同,华北大农村接收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各级集市活动,而在高碑店村,附着于庙会的集市活动与村民的外出行商共同构成了不同文化空间的联通途径,从而使村落呈现出开放的特性。这种开放性自然也体现在村落节日文化的传统当中,使其易于和京城区域社会的文化体系相互关联、频繁互动。

前文提到,节日体系一致性的延续往往体现在节日程序的安排上,而地方性则表现在对节俗活动的特殊选择上。如果将民众在节日生活中的每一种选择都视作一个文化文本,那么我们对节日地方性的研究,就不应局限于挖掘节日在地方的特异表现,而应通过分析个人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来把握民众所属地域社会内部的文化逻辑,以及这种逻辑与一个更大区域文化逻辑之间的关系。

五、小 结

本文的研究,乍看之下似乎意在展现一个个案的特殊性,但实际上,这个“特殊个案”真正的呈现目的,并不是想归纳出一种具有本质区别的异型文化,而是希望通过它来说明民俗文化的地方性异质表现及其形成原因。“对于民俗地方性存在的观察与理解,即对于



‘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现象的注重，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节日研究方面，尤其需要加强对各地方节日活动的具体调查，加深认识这些节日活动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手段，如何叙述和解释了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宇宙观和人生观等。”^③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本文希望通过解析高碑店村关于特定节日的民众记忆中出现的失衡与认同之间的张力及其发生动因，来说明一个地域性社区内部民众整体生活形态对节日传统构成的意义，以及这一传统构成和变迁过程中的地方性表现。如果说高碑店村是特例的话，那么这个特例恰恰说明了节日传统在地方的延续方式，并从地域或区位空间的视角，让我们发现民众记忆与地方性历史叙事的相互关联，进一步明晰民族节日体系的一致性与节日传统的地方性之间的互动、民众能动创造与文化轨范制约之间的张力。

（本文成果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为 05BSH030）

①在西方现代的思维框架中，“地方”往往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指涉一个内部群体相互关系的心理归属，以及他们从外部对该地区的区域认同意识。这种地域认同意识，即一个地域性社区内部的民众（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可被分享的地缘意识。

②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地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李放春译，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神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虽然民俗文化的分布往往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但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与现实操作的考虑，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进行限制性的民俗文化考察，以便对其特质进行理性的归纳，只要这一区域内部的民众对于该地具有地方感。

④刘铁梁：《节日文化的地方性——以浙江沿海渔村调查为例》，载《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研讨论文集提要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6年。

⑤老闸窝原名平津上闸，是通惠河上的一座重要闸门。为节制水流，便于行船，通惠河的主要干线上修建了系列水闸。水闸从西向东依次为广源、西城、朝宗、海子、文明、魏村、



籍东、郊亭、杨尹、通州、河门,共11个闸名24座闸。据《元史》记载,其中一些闸名在元贞元年被改称。“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河,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庆利,杨尹闸改名薄济。”文中提及的“改名为平津的郊亭闸”即是现今的高碑店闸。至今,水面上仍留存着古代石闸闸梁和闸墙的遗迹。这座古闸分别于1950年代和1980年代重建。闸前蓄水28万立方米,为北京热电总厂冷却循环水的天然冷却场,主要担负防洪任务。

⑥由于漕运的中断,当地居民也逐渐脱离了世代依靠漕运谋生的生活;但是,并没有就此终止运河文化对当地的影响。高碑店村人利用河道埋塞,开塘养鱼、在城里贩鱼(包括在前门西河沿等地开设鱼市场以及村民个人以游商挑挑儿的方式贩鱼),从而形成了新的标志性文化,以这种新形式使高碑店人的日常生活与京城百姓生活发生了关联。

⑦王明珂在《要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中做过相关的陈述:“透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讨论,‘历史’常被理解作为一种被选择、想象甚至虚构的社会记忆。……任何有中国特色其实都是一种确定族群范围的认同和记忆。”载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9年。

⑧叶舒穷、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第10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高碑店村民众惯于将“端午节”称为“五月节”,因此,下文将采用“五月节”的称谓以更好地体现出局内者的文化视角以及民俗文化的地方性。

⑩关于华北地区传统村落中的过年习俗,许多史籍和相关著作对此都有过介绍与研讨,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民众对每天的活动和饮食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说法,并且相沿成习,流传至今。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⑪所谓踩岁,即在大年三十的清早,把芝麻秸从各屋屋门的甬路铺到大门道,家里人进进出出,踩踏到上面嘎嘎作响,取踩去旧岁迎新岁之意。

⑫在高碑店村,按照民间习俗,过年期间也颇有程式,亦有特定的称谓和相沿成习的娱乐、祭祀、饮食等内容。分析高碑店村村民记忆中典型的年俗事象,可以发现它与北京大年俗在模式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内容详见《高碑店村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纂,2005年。

⑬具体内容见《高碑店村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纂,2005年。

⑭刘铁梁:《节日民俗展示社会秩序的意义——以贵州台江县姊妹节与划龙船节的关系为例》,载《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提要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4年。

⑮作为一个经济空间理论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或许可称作系统地论述中华帝国的区系格局的第一人,他用经济决定论解释了国家与社会在传统中国的兼容



并存,并用正式的经济模型和目的论的理性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

⑯据高碑店老人的记忆,他们的长辈曾有这样的说法:南方来的漕船船工,每到端午节都停船歇工一天。从四月到九月,是漕运繁忙的时节,船工却例于五月初五休息。这种对端午的重视,很有可能在长期的融合之后,成为当地特有的习俗。具体内容详见《高碑店村落民俗文化志调查资料》(内部资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纂,2005年。

⑰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⑱在高碑店村的娘娘庙会上,有许多娱乐活动如拉洋片、耍耗子、耍鸟丢丢等都是从北京城里的天桥等娱乐场所流动过来的。

⑲娘娘庙会的集市性交易物主要以农具为主,其会期恰逢种地农户五月麦收之时,因此具有应时的实用性特征。可见,庙会的会期与当地民众的行业特点、生活规律是相适应的。

⑳刘铁梁:《节日文化的地方性——以浙江沿海渔村调查为例》,载《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研讨会论文集提要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主编,2006年。

(康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博士;关昕:北京民俗博物馆资料室副主任)

田 万万数据
WANFANG DATA

